

# 毛泽东诗词中的群众语言

毛泽东历来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现实生活学习语言。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这么强调,自己写文章、作报告乃至写诗填词都大量运用群众语言。他的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诵、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 民谣谚语直接引用入诗

《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自注,“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对“武昌鱼”注释道:“据《三国志·吴书·潘濬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是化用。”“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既体现出长沙、武汉不同的风土人情,更表达了毛泽东从长沙前往武汉畅游长江的急迫心情。《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出自清代《增广贤文》中的旧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登山本是寻常之事,而“莫道君行早”却写得颇有气氛,也显示出毛泽东的兴致很浓。《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句,化用旧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不仅极大地增强了谚语本身的表现力,而且与开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前后呼应。

如果说上述的引用属于照搬套用的话,那么在《卜算子·咏梅》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之中,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附作者原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毛泽东借用民谣“离天三尺三”成句,极为夸张地写出山势的高峻,又反用“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之句,用以形容红军非但没有低头下马,反而快马加鞭,飞腾而过。活用一句民谣,于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气概跃然纸上。

## 采用大众话语方式写诗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三不四不的词汇。”“适合大众需要”“反映民众生活”,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这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诗学主张中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生动活泼、言近旨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将口语入诗。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代王昌龄《从军行》“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诗句略显古板,颇似呈送上级的战报。而毛泽东则把着眼点放在欢呼雀跃的

红军战士身上,鲜活地展示奔走相告的喜悦情景。《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既写出反动军队“步步为营”的狰狞面目,突出蒋介石屡战屡败的可怜嘴脸,更反衬出革命军民庆祝胜利的欢欣鼓舞。《七律二首·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像民间艺人在说评书,描绘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动场面。《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不爱红装爱武装”,用平易近人的口语,生动刻画出新中国妇女英姿飒爽的崭新风貌。

## 从民歌中汲取丰富营养

1957年1月《诗刊》杂志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作品时,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等人写的信中指出:“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据梅白回忆,毛泽东曾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毛泽东认为古典诗词在诗体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他也深刻地认识到,要使古典诗词艺术之树常青,“一万年也打不倒”,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毛泽东重视诗词的语言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在致力于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无疑为古典诗词推陈出新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学习强国)

# 雀儿山上的英雄们

西藏地域辽阔,山高路险,解放前没有现代化交通设施,处于交通落后和封闭的状态。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把修筑康藏公路作为西南地区一项重大建设任务,成立了康藏公路工程委员会(对外称修建指挥部)。打通雀儿山,是争取1952年通车昌都的关键。1951年初冬,修建指挥部决定抽调修建甘孜机场的部分部队,突击打通雀儿山。

雀儿山山峰峦叠嶂,设计的公路线从雀儿山山口通过。山口海拔5047米,上下山路线长60多公里,初冬的雀儿山气温已降至零下20多摄氏度,地面覆盖一两米深的积雪,冻土层达一米厚。使用镐锹等工具仅能砸出一道白印。高海拔地区水的沸点低,水烧到70至80摄氏度就沸腾,做出来的饭都是半生不熟,帐篷经常被寒风吹垮,生活和施工条件异常艰苦。

施工部队第一六〇团团团长孙守芳、政委李九盛与第一五九团团团长冉宪仪、工兵第八团团团长张启泰等多位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鼓励部队艰苦奋斗,发动群众开展施工竞赛。首先是对付冻土层,把树枝堆放在冻土上,用“火攻”的方法,烤化一层挖一层,终于征服了20多公里的冻土带。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全靠人工用钢钎打眼、放炮、开凿石方。许多战士在无法立足的悬崖峭壁上,用绳子拴在腰间,悬空打炮眼。工兵第八团五连战士杨海银在高山缺氧的条件下,使用8磅重的大铁锤连续打了1200锤,被誉为“千锤英雄”。第一五九团三连班长张福林创造了两包炸药炸掉1010立方石头的记录,提高工作效率26倍。在热火朝天的筑路竞赛中,许多干部、战士打锤、挖土不止,往往停工休息的号声多次催促,大家仍不肯放下手中工具,以致指挥员必须下令,让共产党员带头才能停工休息。可以这样说,当时的气温是零下30摄氏度,开水沸点是80摄氏度,而大家的工作热情达到了100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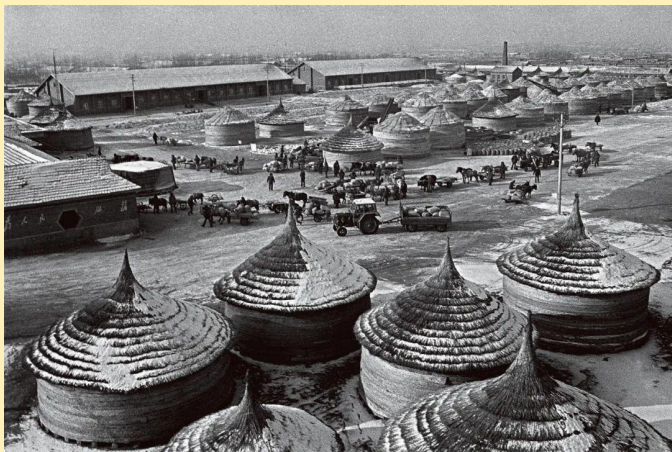
1951年12月10日中午收工后,班长张福林为了连队午后施工安全,在工地检查炮眼及装药情况时,突然被山坡上坠落下来的一块石头砸在身上。卫生员和同志们在他抢救他时,他说:“不要管我,快把公路修到拉萨去!”“不要给我打针,我不行了,请节约一支针药吧……”他的一腔热血,染红了雀儿山的冰雪。

临牺牲前,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45000元(旧币,折合人民币4元5角),向指导员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张福林牺牲后,同志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上级发给他的简单的日用品外,还有从他的家乡河南扶沟县带来的5包菜籽。他曾把菜籽播在他走过的地方,还准备把这象征生命的菜籽播在边疆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多好的战士啊!后方部队党委批准追记他荣立一等功,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其所在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人民日报》于1952年5月18日发表《学习张福林忘我精神》的短评。他的英雄事迹和建设西藏的理想,成为长期鼓舞部队艰苦奋斗的光辉榜样。1952年1月17日,筑路解放军以简陋的工具和血肉之躯,不到半年时间就建成了雀儿山公路。(西藏日报)

# 镜头里—— 改革开放之初的东北农村



▲报纸贴糊糊墙,年画纳福贺祥,家里家外喜洋洋堂堂。吉林省桦甸县公吉乡,1982年



▲冬日打完场,农民往国家的粮库交粮、卖余粮。吉林省榆树县,1985年



▲获得“精神文明村”称号的双榆村用户全都买到了当时紧俏的名牌自行车,成了东北“永久”第一村。吉林省德惠县,1985年



▲从农田走进油田的大中专毕业生。吉林省扶余县,1986年

(南方人物周刊)

# 张家鸿:八千里路云和月①

张家鸿,1925年出生在江苏省东海县,两岁时一家老小,到响水县小尖镇周集居委会落脚谋生。

张家鸿的父亲,有个染匠手艺,人又勤快,在周集小街上开了一家小染坊。一家人起早贪黑,凭手艺挣钱勉强过日子。

张家人穷志不穷,家鸿的父亲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有出息。让大儿子家伯、三儿子家乔在家干活,让二儿子家鸿到附近学校读书。家鸿十分懂事,在学校读书刻苦,一有空就帮助父亲在家干活,有时还独自一人去几十里外的响水口进货。

“7·7”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在校读书的张家鸿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参加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由于张家鸿思想进步,工作积极,1942年在老师徐云峰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考入抗日

军政大学五分校政治队。家鸿参军后,汉奸将他哥哥抓去,企图逼家鸿回来,最后竟将哥哥活活折磨死。家仇国恨更坚定了家鸿的革命意志。

张家鸿抗大毕业后,分配在新四军三师八旅,从此,南征北战,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戎马生涯。张家鸿参军后参加了攻克阜宁、解放陈家港、攻打“两淮”等一系列战斗。在抗日的烽火中迅速成长,先后担任连队的文化教员、排长、连指导员。1945年9月28日已是连指导员的张家鸿带领他的连队未及解弹去解放“两淮”的征尘,就在师长黄克诚的率领下,向东北开进。

张家鸿随部队从苏北出发,徒步向东北开进。开始,开赴东北的命令只传达到团级干部,张家鸿他们并不知情。到山东后才知道即将开赴东北。快到山海关时,张家鸿因连日奔波病倒了,持续几天寒

颤高热,抖起来几个人都按不住,后来连走路、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军医诊断可能是患了恶性疟疾,这是一种蚊虫媒介传播的传染病。部队只好把他安排在当地一位老乡家养病。临走时,营长高克安慰他安心养病,说:“等你病好后,我们一起去杀敌立功”,并告诉他部队出发的大体方向、路线。

张家鸿在老家治疗休养一段时间,毕竟年轻,生命力旺盛,病很快就痊愈了。病好后,虽然身体虚弱,但在老乡的精心调养下,恢复很快。他想到大部队的正大步的前进,与他距离越来越远,十分着急。待体力稍微恢复,他就不顾老乡的劝阻,追赶部队去了。

他一路问,一路赶,日夜兼程向东北追。当时抗战刚胜利,沿途还有许多原日伪据点,伪军们又摇身一变,成了“治安军”。张家鸿路过一个小镇时,被“治安军”抓去。张家鸿见多识广,能编会说,很快

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也放松了警惕。趁敌不备,张家鸿夺得一枝短枪,打死了一个小军官,抢了一辆自行车,飞奔而逃。

自行车骑了几天后坏了,又没法修理。聪明的张家鸿干脆把车子拖到村里,与老乡换了头小毛驴。他骑着小毛驴,日夜兼程,在冰天雪地里追赶部队,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三千里,在快到齐齐哈尔时,才追上了队伍。途中几次遭遇土匪,侥幸脱身。当高营长和战友们看到骑着毛驴、一脸憔悴的张家鸿真是又惊又喜,兴奋地紧紧抱在一起。

张家鸿归队后,他凭着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历经曲折磨难,千里走单骑,万里赴戎机的传奇故事,在部队里传为美谈,成为部队政治教育的一个活的典型。经部队党委研究,特给他荣记一等功,授予“一等功臣”称号。(未完待续 转自红笺留香)

# 历史上的今天

## 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

新四军军部,是新四军领导机关的总称。1937年12月25日在湖北汉口成立,当时只有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来和军长叶挺邀集的少数工作人员。1938年1月6日移驻江西南昌,开始建立工作部门。

新四军军部,设有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兵站处、军法处、后方留守处和政治部。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1月20日的命令,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江苏盐城重建军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1943年1月供给部、卫生部合并为供卫部。1944年10月供卫部重新分为供给部、卫生部。1945年10月28日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并从12月3日起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1947年1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与华中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华东军区领导机关。



##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指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奋战7昼夜,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被扣押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夏秋遭到失败后,又把中心转向华中。1940年6月至9月初,国共两党就中共合法地位、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问题、作战区域划分问题展开谈判,因蒋介石坚持八路军、新四军开至黄河以北而陷入僵局。此时,日本急欲结束中日战争,抽身出来进攻太平洋地区英、美、法等国的殖民地,对蒋介石再次展开诱降活动。德国驻华大使也劝蒋介石投降日本。英美等国因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对国民党尽力拉拢。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加紧制造新的反共磨擦。

